

# 国民性的内涵及其养成

吴晓蓉, 林倩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 重庆市 400715)

**摘要:**“国民性”概念缘于欧洲启蒙运动。其历史源流显示,“国民性”兼具两层内涵:政治意义上,与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密切相关;学术意义上,表示一个民族与其生存的文化生态系统相互适应形成的共同心理结构。现代教育,需从关注人的精神成长,从民族性格与文化认同角度,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发挥“民族文化心理场”对国民性的养成作用,构建塑造现代国人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的动态、交叉、立体的教育生态,培养国民的国民性。

**关键词:**国民性;国家精神;民族认同;公民意识;国民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379(2014)02-0012-08

“国民性”一词,源自英语的 national character 或 national characteristic,属于“先由日本人以汉字的配合去‘意译’或部分地‘音译’欧美语言,再由近代国人搬进现代汉语,加以改造而成的现代汉语外来词”<sup>[1]</sup>。其产生与使用语境的差异,导致其在中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内涵差异。追溯其西学渊源及内涵流变,有助于理解该词内隐的价值取向和指代范畴,为国民性的形成与培养提供教育学思考。

“国民性”与国民(nation)的概念密不可分。nation 最早的源头是拉丁文 nasci-(出身),而后从拉丁语 natio 一词转化而来。“拉丁语的 natio,本身具有‘血统、种族’的意义”<sup>[2]</sup>。到中世纪,natio 的涵义发生了变化,表示“因出身地不同而相互区别的大学生团体,或者宗教公会成员的地域归属”<sup>[3]</sup>。到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赋予 nation 新的意义。

中世纪后的欧洲,相继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和科技革命。整个欧洲从中世纪的教会统治中解放出来,教会让出的权力真空由君主制填补。以前绝对神权统治的统一的世俗社会,现在变成专制王权统治的分裂的世俗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与君主分享权力,引发了与君主制的矛盾与斗争。为取代“君权神授”,为权力分享寻求合法理由,现代国民的概念应时而生。同时产生的还有国民性——将各国国民凝聚以建立国家的基础。这意味着,“国民性”概念的提出与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建立密不可分。

18世纪启蒙运动中,“国民性”论述多分散在文学作品或政治论著中。这一时期,国民性不是论述的目的,而是表达政治诉求的论据。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de Montesquieu, 1689-1755)在《论法的精神》中,分别论述了“人怎样因气候的差异而不同”、“某些南方人民的性格矛盾”,意在说明“如果精神的气质和内心的感情真正因不同的气候而有极端差别的活,法律就应当和这些感情的差别以及这些气质的差别有一定关系。”<sup>[4]</sup>这里,孟德斯鸠对国民性问题的探讨,源于论证法律制定原则的需要。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国民性”表述虽较多,却未能形成共识。d'Argens 侯爵(Jean-Bap-

\* 收稿日期:2014-03-03

作者简介:吴晓蓉,教育学博士,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林倩,西南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

tiste de Boyer, Marquis d'Argens, 1704—1771)认为:一个国家的所有居民构成一个民族,这一民族具有的一系列特性称之为“国民性”(le caractère de la nation)<sup>[5]</sup>。孟德斯鸠认为,“国民性”(l'esprit général)是美德、思想行为习惯,是在气候、宗教、法律、社会管理准则、历史及风俗习惯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sup>[5]</sup>。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 1715—1771)则将“国民性”视为品行和内在品质,例如一系列的美德和恶习:骄傲、勇气、软弱、残忍、忠诚、庄重、轻浮<sup>[5]</sup>。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年)首次为“国民性”赋予了政治意义,将国民性与民族意识(national consciousness)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国民性是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的基础,而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又是自由政府、主权确立的基础<sup>[5]</sup>。

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使“国民性”成为了民族主义构建的实践基础。“为未被承认的民族崛起合理化,为已获得民族解放的國家的新政权合法化”<sup>[6]</sup>,因此, national character 既有译成“国民性”的,也有译成“民族性”的; nationality 既当作“民族性”,又当作“国民性”<sup>[7]</sup>。随着欧洲各国相继独立,对内起凝聚作用的“国民性”表述,逐渐成为其对外扩张的合法理由。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定地域的人群与文化生态系统<sup>①[8]</sup>相互适应,逐渐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及特定的习惯、态度、情感等比较稳定持久的精神状态、心理特征。此时,这些精神状态、心理特征尚未被冠以“国民性”,有实无名的“国民性”处于一种自在状态。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寻求民族国家建立的合法性,伴随民族的觉醒,“国民性”由自在转为自觉。然而,最初“国民性”只是历史事实(a historical fact)的描述,至18世纪末,“国民性”开始被视为促进改革的现实基础,是一种积极的政治力量(an active political force that must be fostered as the basis for reform)。

到今天,“国民性”内涵依然无明确且权威的定义,却在“国民性”名义下糅合与衍生了一系列的复杂阐述与微妙关系。一为文化、民族、国家,一为个人与国家。一定地域的人群创造了特有的文化,并形成特定的文化生态系统;独特的文化生态系统又影响、制约生活于其中的人群,形成独特的“国民性”。国民性正是人与其生存的文化生态系统相互适应中形成的共同心理结构,并外化为一定的行为模式,进而“国民性”成为一民族乃此民族而非他民族之根本。与此同时,鉴于“国民性”对国家的重要性,各国将其主导价值理念融入理想“国民性”的建构,并以此为导向塑造每个国民,将社会需求与个人发展统一。上述理解虽内涵存异,但不难看出,都蕴涵着“国民性是一民族与其生存的文化生态系统相互适应的结果,其核心为民族认同”这一共同的价值取向。在此意义上,当“国民性”不可避免地与国家政治相连,成为具有价值取向的事物,理想“国民性”遂成为国民塑造的目标。

## 二、中西语境下“国民性”内涵的演变

“国民性”的丰富内涵显示,其产生之初就暗含了既作为政治概念,又作为学术概念的两种发展路径。作为政治概念,“国民性”始终与民族国家的建立、改革、发展联系在一起;作为学术概念,“国民性”是一种客观事实,其研究围绕着国民性的决定因素、各国国民性的异同、不同国民性对国家的影响等,同样为民族国家的改革、发展提供理据。

### (一)“国民性”作为政治概念的中文流变

在我国,多数人都认同“国民性”乃近代西学东渐之产物,其实质性的价值取向与指代范畴,却在引进之后有了自发变迁,这从不同历史时期的表述差异可以看出。

多数学者认为,“国民性”这一概念最初是由梁启超等晚清知识分子从日本引入中国的。而王学钧认为,“晚清国民性概念的引入,有两条通道,一是似乎无需也缺乏定义的日文媒介,一是有明

① 所谓文化生态系统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三部分。自然环境是群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社会环境是与群体生活相关联的各种社会条件的总和;精神环境是该群体所共有的道德观念、价值体系、风俗习惯、宗教形态等诸方面的总和。

确定定义的英文媒介”<sup>[9]</sup>。英文媒介的引入是梁启勋。1903年,梁启勋在《新民丛报》连载《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论文。文章将“国民性”定义为:“不能求之与生理,惟当求之于心理上。心理学者盘踞各民族制度、技术、信任、政治之里面,而左右其进化者也,谓之道德的及智力的特性。此道德特性智力特性相结合而成民族之精神,实其民族一切过去之总合,而共同祖先之遗产也。”<sup>[9]</sup>此时,正值梁启勋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

19世纪中叶始,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就试图对国民心理(national psychology)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sup>[10]</sup>。到20世纪初,国民心理学已成为西欧及北美各大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梁启勋的论文,该是在美国接触国民心理学有关国民性的研究后撰写的。若沿此路径,从国民心理学角度研究国民性,“国民性”在我国可能也会转化成多数人格研究。但纵观近代对国民性的批判、改造,未见从心理学角度的任何后续研究成果。据此推断,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也不是直接源于欧洲,而是沿着欧洲—日本—中国这样一个西学东渐的传播路径进入我国的。

西方社会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是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潮的理论基础。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正是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强调改造国民性的理由。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引入“国民性”概念,随后引发了国民性改造的系列探讨。1902年至1906年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二十篇政论文章,后汇编成册《新民说》,可以说是借由西方及日本的国民性理论对维新变法时期教育改革思想的进一步阐述。《新民说》释新民之义:“新民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梁启超还分别论述了中国国民所缺乏的各种品格:公德、国家思想、冒险、权利、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生利、毅力、义务、尚武、民气及政治能力<sup>[11]</sup>。在这场思想启蒙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既积极汲取西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现代价值,更致力于建构一个全新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秩序。

国民性改造思潮虽脱胎于福泽谕吉等人,却又有所不同。“现在称西洋各国为文明国家,这不过是在目前这个时代说的,若认真加以分析,它们缺陷还非常多。”<sup>[12]10</sup>“现在虽称西洋各国为文明国家,西洋也有守旧愚顽的人,亚洲也有智德兼备的英俊之士。然而,说西洋是文明的,亚洲是半开化的,就是因为在西洋,蠢人未能施展其愚顽,亚洲的英俊之士不得发挥其智德。其所以不能施展与发挥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并非由于个人的智愚所致,而是由于受到全国风气束缚的缘故。”<sup>[12]42</sup>在对待西方文明与本民族文化上,福泽谕吉强调坚持民族自信、发挥自身优势,以扬长避短的态度接纳别人、改造自身。而当时中国知识阶层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以此衡量国人,造成国民性批判的绝对化。随着国民性批判的深入,中国的专制政体、传统家族制度、传统学术思想与道德风尚,直至整个中国文化传统无不遭到批判。

在《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研究综述》中,袁洪亮将国内学术界对国民性的界定分为四种:其一,“国民性是指一个民族多数成员所普遍具有的比较稳固的社会心理特征、精神状态,它是多数国民所具有的稳定的、反复出现的心理特质,是一种深藏于心灵深处的潜意识,属于低层次的社会意识,从本质上说,它是那个民族国家中的社会心理”;其二,“国民性是通过国民的行为倾向表现出来的,由一种心理特质所组成的普遍的人格类型”;其三,“国民性指的是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其四,中国人的劣根性,或称为“国民积习”。<sup>[13]</sup>上述四种,包含了“社会心理、人格类型、文化心理结构和国民积习”四大范畴,无论哪种理解,都明确显示,国民性直指一个国家个体或群体的心理反应或行为表现。研究以“国民性”为主题,在中国知网(CNKI)查询,发现1979年至2012年的时段里,与“国民性”相关度最高的词分别是:鲁迅、国民性改造、改造国民性、国民性批判及梁启超(见图1)。与“国民性”研究相关度最高的学科分别是:中国文学、中国近代史、哲学、政治学、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中国文学占了一半以上(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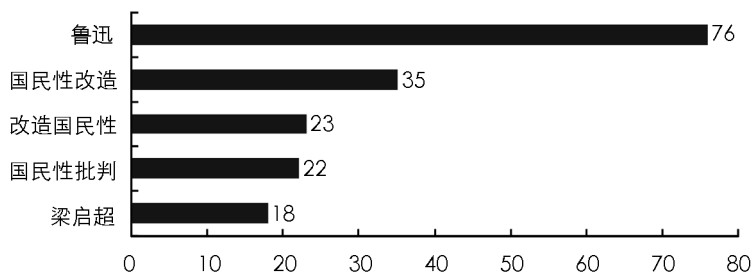


图1 CNKI上与“国民性”同现最多的关键词(单位:次)

注:数据统计截止至2013年4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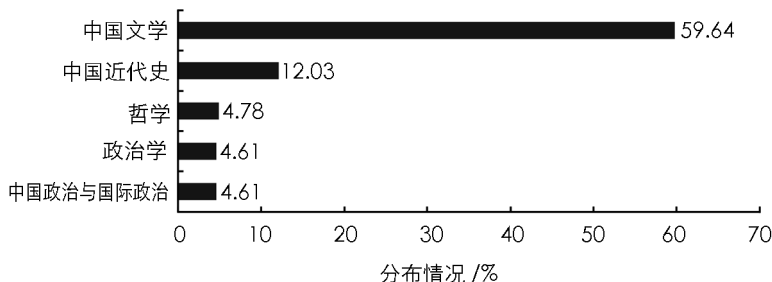


图2 CNKI上“国民性”研究在不同学科的分布情况

注:数据统计截止至2013年4月18日。

图例显示,我国的国民性研究多沿用近代“国民性改造”一词,且将其作为一种文学或政治思潮,从历史、政治角度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或对其进行反思,致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民性”被赋予较强的政治内涵,并作为政治概念而广泛使用。

## (二)国民性作为学术概念的西语源流

西方文献中,未能查询到关于国民性内涵的普适性界定,但从学科角度对国民性予以阐释者并不少。哈布斯·杜伊杰克(Hubertus Duijker,1912—1983)和尼克·弗里达(Nico Frijda,1927—),将国民性定义分为六类:(1)一国民众具有的区别于他国民众、所特有的一系列心理特征;(2)一个社会成年成员所具有的最普遍的行为模式;(3)一个社会多数成员所共有的一系列行为、价值及风俗习惯;(4)属于同一文化的人群在标准化、社会化及教育过程中形成的持久的、具有延续性的基本人格结构;(5)可学习、继承的文化行为及一整套规范、价值、观念,并为文化机构所认同,体现于其文化产品中;(6)文学、艺术及哲学中呈现的相当于民族精神的内在精神<sup>[14]</sup>。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艾利克斯·英格尔斯(Alex Inkeles,1920—2010),将国民性定义为“社会成年成员中具有众数特征的、相对持久的人格特征和模式”<sup>[15]196</sup>。

以“national character”(国民性)为主题,1900至2013年为时间段,在Web of Knowledge上查询发现,位列前五位的研究方向分别是环境科学生态学(environmental sciences ecology)、社会学(sociology)、心理学(psychology)、政府法律(government law)、企业经济学(business economics)(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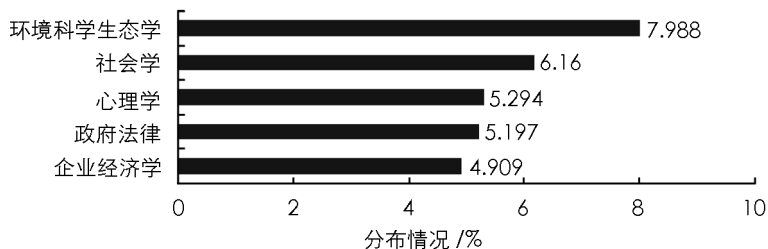


图3 Web of Sciences上“国民性”研究方向的分布情况

注:数据统计截止至2013年4月18日。

可见,在西方国民性研究中,“国民性”是客观研究对象,不存在优与劣的价值判断。而且,为提

高国民性研究的客观性,将其转换为“众数人格”<sup>①</sup><sup>[15]</sup><sup>3</sup>以便测量。从“国民性”的客观性、中立性看,西方话语中的“国民性”是一个学术概念。

早在“国民性”概念提出之前,类似某一族群特性的描述就散见于各种游记或史料。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Fulton Benedict,1887—1948)的《文化模式》在国民性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但国民性真正进入科学的研究领域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9年,美国的人类学家成立了“国民意志测试委员会”(Committee for National Morale),为战争做准备。早期,他们通过研究美国的文化,对战斗中如何保持美军的战斗士气提供建议。随着战争的发展,这一委员会的关注点由国内转向国外,加强了对盟国特别是敌对国家国民性的研究,以便为政府决策提供建议。<sup>[16]</sup>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就是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

自20世纪50年代,国民性研究热潮消退。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结束,政府需求减少;另一方面是由于国民性研究自身的问题。虽然人类学家开始研究现代社会国民性的各个方面,但研究对象仍囿于未开化或落后族群,这使得人们质疑国民性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为提高研究的准确性、客观性,研究人员从研究方法上着力,如采用统计分析,试图建立一套普遍适用的概念和描述性的变量体系。近年,随着国际合作的不断增加,对国民性研究的现实需求有所提升。伴随研究者的不断努力,国民性成为多学科探究的主要问题,逐渐实现从隐到显的过程。

综上所述可以察见,“国民性”术语不论是作为政治概念的中文流变,还是作为学术概念的西语演进,都包涵着这样的共同理念:国民性研究关注的是群体心理的共时态差异,即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不同国家或民族成员共有的社会心理特征及民族间的社会心理差异<sup>[17]</sup>。

### 三、“国民性”养成的教育意蕴

既然国民性是一个国家个体或群体的心理反应或行为表现,对心理反应或行为表现形成与发展的追本溯源,既属于哲学、心理学的研究范畴,也当属于社会学、文化学,尤其教育学的关注领域。因为,民族国家建立后,一个国家个体或群体的心理反应或行为表现,必然涉及“国民性”培养。所谓形成或培养“国民性”,是以“国民性”的可塑性为前提,以某一价值取向为衡量标准,对原有“国民性”的扬弃。以人的可塑性为前提的教育,责无旁贷该担当起国民性养成的重任。因此,作为塑造国民性的最有力手段,教育将国家对理想国民性的构想融入其中,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 (一)培养具有民族认同感的现代公民

民族认同是“国民性”的核心。在全球化的今天,价值观念和文化的多元化对各国国民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各国在国民性培养上,愈加强调自身独特的文化和价值,强调加强民族认同。以日、韩、新加坡三国为例。1996年,日本文化厅发表的《文化立国21世纪方案》中,教育改革的目标为培养“珍视日本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具有丰富国际感觉的日本人”<sup>[18]</sup>。20世纪90年代,“儒家学说作为指导教改的思想基础成为韩国教改模式的三大特征之一”<sup>[19]</sup>。而“新加坡的国家意识教育就是要使人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即: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心理上认为国家是自己的国家,是自己生活所依持的国家,同时明确意识到自己是该国家的一份子”<sup>[20]</sup>。培养和塑造国民性,加强民族团结,激发民族精神,仍是国民教育的目的。

此外,每个国民是处于具体时空下的人。就空间而言,中国人要面对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就时间而论,人是立足于现在,继承传统、面对未来的人。近代以来,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一直是两个纠缠不清的问题。“现代”不仅是一种时间尺度,也成为一种价值尺度。作为培养人的实践活动,教

---

<sup>①</sup> 众数人格(modal personality)是指每一种文化中人们共同具有的心理特征。众数人格是建立在心理统计基础之上的实证分析,是指统计分布上具有明显集中趋势点的心理特征值。众数是一个统计学概念,是一组数据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数值,代表数据的一般水平,众数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

育理论发展正是基于对人认识的反思。理想人格是系统教育理论建构的核心。不同时代的教育家以不同的信念构建各自的理想人格:夸美纽斯推崇“宗教人”;赫尔巴特志于塑造“道德人”;杜威则肯定“经验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教育都需明白并明确:国家发展、文化传承、社会延续,需要具备何种共有的社会心理特征及民族气质的人。具有中华民族认同感的现代公民,应该是这一时代我国教育所应达到的目标。教育,当也必须在各种不同理想人格的建构中,不断探寻人类幸福之道。

## (二)以国民教育塑造“国民性”

国民教育思想源于欧洲近代启蒙运动时期。启蒙运动哲人为民族国家建立提出了“国民性”,并认识到教育对国民性形成和培养的重要意义。1763年,拉夏洛泰(La Chalotais, Louis Ren de Caradeuc de, 1701—1785)出版了《论国民教育》,深刻批判和彻底否定了教会教育制度,提出了公民教育的概念,认为教育目的应是为国家培养公民,必须从根本上重建整个教育制度。

德国率先形成国家教育制度<sup>①</sup>[21],实施国民教育。就国内而言,国民性强调普遍性,强调每个国民对民族的认同;就国外来说,国民性强调民族性,强调自身的独特性。因而,近代西方国民教育在教育控制权、教育体系及教育目的、内容上都不同以往。首先,教育制度国家化。鉴于国民性对国家的重要价值及教育在国民性培养中的重要作用,教育成为国家事务,其控制权也由教会转向国家。国家出台法令规范教育,提供教育经费并对之进行管理;而教育须承担建设国家政治、道德和文化的职责。其次,教育普及化。一方面,完善初、中、高级学校教育体系,扩大受教育阶层;另一方面,颁布义务教育法令,扩大教育对象,以国家的要求和标准塑造国民。第三,教育目的及内容强调民族性。“每个国家的教育目的都应是激发公民精神;而对我国来说,教育目的应该是培养法国人,是为了形成法国人,努力将他们造就成人。”<sup>[22]</sup>强调民族国家的统一,民族文化传统的维护,培养服从、奉公、牺牲、爱国的公民,成为国家教育的目的。在此教育目的指导下,教育内容有了很大改观。本国语言、文字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而此前学校教育只教授希腊语和拉丁语。即使到了1837年,普鲁士的法令还规定,在文科中学的整个课程中,“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教学占46%……法语占4%”<sup>[23]</sup>。由于学习历史、地理有利于受教育者了解民族的过去、认同民族文化、深化对国家的感情,也被纳入教育内容。

在我国,教育学的引入与师范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密不可分。此后,教育不断专业化,教育学由一门“subject”变为“discipline”<sup>②</sup>,形成庞大的学科体系。学校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地位也日益突出,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功能,成了教育的‘轴心’。”<sup>[24]</sup>然而,位于“轴心”地位的学校教育却愈加背离真实的生活,造成教育的“异化”。其既表现在教育目的工具化上,也体现在学校教育与人生活场域的分离。效仿西方建立起来的现代学校教育“在教人羡慕别人同时在逐渐抛弃自己的传统,使个体视自己祖辈赖以生存的文明为原始、愚蠢与毫无用途的”<sup>[25]</sup><sup>155</sup>。而国民性,恰是植根于各民族丰富而鲜活的社会、文化生活之中,对个体整个民族精神世界的塑造,需着力于此。

现代教育要塑造族群“国民性”,需改变“把人的发展等同于教育,把教育等同于学校教育”<sup>[25]</sup><sup>161</sup>的认知局限,从关注人的精神成长,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角度探讨族群属性,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构建塑造现代国人人文素养、公民

① 国家教育制度的英文表达有二:State Education System,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在我国教育史研究中常把后者译成“国民教育制度”。从语义上分析,national的中文表述是“民族的”、“国家的”,但“民族教育制度”与“国家教育制度”又不尽相同。每个国家的教育制度都各具特色,National意义上的“国家教育制度”具有国际比较的特点。而State却多指政权意义上的国家,它相对的意义是“地方”,体现了权利关系,是在国家内部空间上的理解。无论是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还是State Education System,都理解为“民族性国家教育制度”较妥。

② 英文中“subject”指一种学科科目;“discipline”指某种科学活动领域及其形成的知识体系,即“a branch of science”科学的一个分支。

意识和国家精神的动态、交叉、立体的教育网络,才能真正实现国民性的养成,使国民具有国民性。

### (三)发挥“民族文化心理场”对国民性的养成作用

国民性是一个国家人在长期历史发展与社会实践中,因外在物质基础和内在精神元素交互作用而逐渐形成的、与之相适应的群体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普遍倾向与特征。这种群体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普遍倾向与特征,可分内外两方面:一种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社会文化心理,以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文化价值取向为特征;二是大多数国民身上普遍具有且重复出现的行为方式、性格特征等,具体体现为国民组织社会生活、处理人际关系的社会道德行为,以及具有道德意义的人格特征。所有上述特征的交叉、共生与融合,构成一个国家个体或群体生活、生长和生存所依托的“民族文化心理场”。教育可充分发挥“民族文化心理场”对国民性的养成作用

文化是构成民族认同的基础和关键,其融以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宇宙观、民族节日、风俗习惯等方式为表征的人文情怀与以山川名胜为空间的自然风景于一体而构成民族文化心理场,其意义在于以“显”和“隐”两种方式,使某一群体或族群产生并形成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从形态与方式看,‘场’意味着空间化的存在和多元的相互作用,即由多方面的因素,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影响了思维方式的趋同。”<sup>[26]</sup>民族认同感的形成过程,其实质是民族文化心理场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以“全息”、网状、立体方式,整体、综合作用于场域个体的教育过程,该过程贯穿于人整体的生活和生命世界<sup>[24]</sup>。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的“生命观是综合的,不是分析的。生命没有被划分为类或亚类;它被看成是一个不中断的连续整体,容不得任何泾渭分明的区别。”<sup>[27]</sup>中国传统把天地跟人、人事、礼仪认作一体的“天人合一”认识论,渗透着自然与人文共生的生存理念与哲学观。

现代学校教育重组织、重形式,重抽象的知识传授和评估,未能充分关照到其存在区域的自然/文化生态与人的具体需求,结果导致其在传授现代文明、引领民族了解现代科技、扫除文盲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在解构“民族文化心理场”、弱化文化影响与渗透性教育功能的发挥上,产生了消极影响,并逐渐导致中华民族自生性共生教育的失落。

即或如此,今天的我国,依然存在融人文情怀与自然风景于一体的、强大的民族文化心理场。国民性的养成,离不开这个心理场。其在教育形态上表现为家庭教育、寺庙教育与社区教育并举;在教育方式上具体表现为随境式、浸润式、生活式、体验式并行;教育场域上表现为家庭、社区、寺庙、工厂、田间地头并存。这些形式的教育,都在发挥其“国民性”养成教育的重要作用。但凡个体生活可能触及的空间,就是一个教育场,具体反映在每个国民日常的饮食起居、宗教活动、丧葬习俗、歌舞活动、人生礼仪等方面。这种立体的多维方式,扎根于个体生活之中的教育,既具目的性、整体性,也具开放性和自组织性,并由此成为中华民族教育的重要构件。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是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趋同思维方式,懂得自知与他知,懂得与自然、与文化、与他人,以及与自身共生、和谐共处的“国民”。

#### 参考文献:

- [1] 高名凯,刘正埭. 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M]. 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88.
- [2] 王东平. 中华文明起源和民族问题的论辩[M].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134.
- [3] 田雪梅. 比较视野下的“国民”概念——兼议近代国民形成的条件[J]. 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12(4):66-72.
- [4]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下[M]. 张雁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27.
- [5] Kra P.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character in 18th century France[J/OL]. Cromohs,2002(7):1-6[2013-11-06]. [http://www.cromohs.unifi.it/7\\_2002/kra.html](http://www.cromohs.unifi.it/7_2002/kra.html).
- [6] Martindale D. The sociology of national character[J/OL].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67(1):30-35[2013-11-06]. <http://ann.sagepub.com/content/370/1/30>.
- [7] 陈春香. 清末国民性批判思潮中的日本影响[M]//松本三之介,李冬君. 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 [8] 张诗亚. 祭坛与讲坛——西南民族地区宗教教育比较研究[M]//张诗亚. 西南民族教育文化溯源.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9] 王学钧. 刘禾“国民性神话”论的指谓错置[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48-53.
- [10] Leisi E. Das heutige Englisch: Wesenszüge und Probleme[M]. Heidelberg:[s. n.],1985:15.
- [11] 梁启超. 新民说[M]//. 饮冰室合集·专集(4). 北京:中华书局,2003:5.
- [12] (日)福泽谕吉. 文明论概略[M]. 北京编译社,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 [13] 袁洪亮. 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研究综述[J]. 史学月刊,2000(6):135-141.
- [14] Dujker H, Frijda N. National Character and National Stereotypes: A trend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Scientific Psychology[J/OL]Tadeusz Kobierzycki.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Character and the Problem of Humanity[2013-11-06]. . [http://dezintegracja.pl/?the-concept-of-national-character-and-the-problem-of-humanity-\(in-kazimierz-dabrowskis-perspective\)-\(en\)](http://dezintegracja.pl/?the-concept-of-national-character-and-the-problem-of-humanity-(in-kazimierz-dabrowskis-perspective)-(en)),28
- [15] 艾利克斯·英格尔斯. 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M]. 王今一,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 [16] Neiburg F, Goldman M. Anthropology and politics in studies of national character[J/OL]. Cultural Anthropology,1998(1):56-81 [2013-11-06]. <http://www.jstor.org/discover/10.2307/656688?uid=368962701&uid=3737800&uid=2129&uid=2&uid=70&uid=3&uid=8250928&uid=67&uid=62&sid=21101964230413>.
- [17] 周晓虹. 理解国民性:一种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兼评英克尔斯的《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J]. 天津社会科学,2012(5):49-55.
- [18] 吴忠魁. 论日本 21 世纪国家发展战略与教改对策[J]. 比较教育研究,2001(1):1-7.
- [19] 张谦. 韩国的教育改革及其启示[J]. 外国教育研究,1997(4):54-56.
- [20] 陈俊珂. 日本和新加坡学校德育特色之比较[J]. 比较教育研究,2002(12):18-22.
- [21] 朱旭东. 格林的教育发展和国家形成理论[J]. 比较教育研究,2002(4):6-11.
- [22] 克伯雷. 外国教育史料[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457.
- [23] 安迪·格林. 教育与国家形成:英、法、美教育体系起源之比较[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36.
- [24] 吴晓蓉. 共生理论观照下的教育范式[J]. 教育研究,2011(1):50-54.
- [25] 吴晓蓉. 仪式中的教育——摩梭人成年礼的教育人类学分析[D].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2003.
- [26] 张诗亚. 强化民族认同——数码时代的文化选择[M]. 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05:96.
- [27] (德)恩斯特·卡希尔. 人论[M]. 甘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04.

## The Connotations of “National Character” and the Way of Cultivation

WU Xiao-rong, LIN Qian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character” first emerged during the age of European Enlightenment. Since then it has been defined and interpreted. Its origins and historical changes show that “national character” combines two connotations. Politically it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nation-state. Academically it represents a common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formed in the mutual adaptation of a nation and its own peculiar cultural ecosystem. To shape the humanity accomplishment, citizen consciousness and national spirit of modern Chinese, modern education should be developed into a dynamic, crossing and all-round educational ecosystem to cultivat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which not only follows the idea of modern humanism education and civic education, but also inherits and promotes the spiri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education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society, to cultivate students”; and which fulfills the play of “national cultural psychological field” to enhance national character and cultural identity based on the philosophy of concerning person’s spiritual growth.

**Key words:** national character; national spirit; national identity; citizen consciousness; national education

责任编辑 邓香蓉